北魏洛阳的汉晋想象
——空间、古迹与记忆

魏　斌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都城空间叠加关系,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于同一空间中的汉晋古迹、人物和事件充满想象,从而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城市情绪,在氛围层面上塑造着拓跋政权与汉晋国家的连续性。《洛阳伽蓝记》记载的隐士赵逸及其古迹指认,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不过,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也存在明显差异,除了众所熟知的寺院、佛塔和坊外,值得注意的是铜铸设施的缺失。汉晋时代,翁仲、铜驼、铜马、飞廉等铜铸设施,构成了从长安到洛阳延续的都城装饰文化。永嘉之乱后这些铜铸设施很多被迁移,北魏迁都洛阳后并未尝试在基址上进行恢复性重铸。

关键词: 北魏;汉晋;洛阳;古迹;记忆

中图分类号:K 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3-0113-12

都城是人文风景最重要的承载空间之一,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统治象征的政治景观,如宫殿、官署和礼制建筑;其次是作为王公、官僚、军人和普通民众生活场所的宅舍、市场、信仰设施和娱乐设施;再次则是都城被放弃之后留存下来的遗址、古迹。前二者是“活”的空间和风景,后者则是作为废墟和遗迹为后人缅怀。

由于统治权力的更迭,历史中那些著名的都城,往往经历过建都—废弃—重建的反复过程。在此过程中,旧都城的空间格局和景观形态,有时会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被刻意延续。北魏洛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东汉至西晋的近三百年中,除去汉末三十年左右,洛阳一直是华夏帝国的都城和权力、文化象征,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西晋末年,洛阳退缩为一个地方城市。一百八十余年后,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在汉晋洛阳旧址之上重建新都,有着很强的空间继承性。

学界对此已有很多探讨。① 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渴望重塑华夏正统的背景下,洛阳城中被叠压的汉晋文化遗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者说,生活在北魏新都洛阳的人们,如何看待脚下土地与“过去”的关系?在这方面,正光(520—525)初年出现于洛阳的隐士赵逸及其古迹指认行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

收稿日期:2022-09-01

作者简介:魏斌,男,山东临朐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① 参看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 年第 7 期,第 42—52 页;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75 页;冀洛源:《考古所见北魏洛阳城址中的历代叠压因素》,《石窟寺研究》第 2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8—277 页。得益于持续的考古发现和《洛阳伽蓝记》的传世,北魏洛阳城一直是学术热点,围绕着都城空间复原及城市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积累颇多。因篇幅所限,在此无法详细列举。最近的复原性研究,参看钱国祥:《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一》《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二》《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分见《华夏考古》2019 年第 4 期,第 78—83 页;2019 年第 6 期,第 72—82 页;2020 年第 5 期,第 86—96 页。

一、隐士赵逸的洛阳古迹指认

赵逸事迹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他自称是晋武帝时人,年龄已经两百五十岁上下,对西晋洛阳如数家珍(“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北魏孝明帝特别给“步挽车一乘”,让其“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后离去,不知所踪。①

赵逸在洛阳的三年间,大概指认了数量可观的“旧迹”。《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六处,应当只是一小部分。具体如下:

方位	地点	赵逸的指认
城东	杜子休宅	“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
城东	建阳里土台	“此台是中朝旗亭也”
城东	晖文里诸宅	“晖文里是晋马道里。(李)延实宅是蜀主刘禅宅。延实宅东有脩和宅,是吴王孙皓宅。李韶宅是晋司空张华宅”
城西	宝光寺	“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
城内	太尉府前砖浮图	“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
城内	昭仪尼寺之池	“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

情节记述最详细的,是城东杜子休宅和城西宝光寺两处。两处有相似性,都是赵逸见到宅、塔后发出感叹,声称此地原为西晋寺院(太康寺、石塔寺)旧址。一开始大家对他的说法颇有疑问(“时人未信,遂问寺之由绪”“人问其故”)。赵逸又对寺院由来做了说明,并具体指出园中某处地下存有遗迹(砖浮图、浴室及井),得到发掘验证。尤其是杜子休园,发掘出了西晋王濬的纪年砖铭(“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最具说服力。② 两处园中当时都是树木繁茂,并没有事先探掘过的迹象,此点极大强化了赵逸的权威性。

赵逸的指认,引发了时人对于洛阳城市空间“过去”的兴趣:

> 好事者寻逐之,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时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③

赵逸声称,昭仪尼寺之池原为西晋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于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④ 步兵校尉李澄向他咨询“太尉府前砖浮图”的由来。汝南王元悦更是“闻而异之”,认其为义父。⑤ 从常理来说,赵逸当然不可能真的曾生活在晋武帝时代。他的这些西晋洛阳知识,究竟从何而来,很难确认。现存魏晋洛阳地志佚文很少提到宅舍和寺院。上述六处“旧迹”中,稍有线索可寻的是刘禅和孙皓故宅。《洛阳故宫名》佚文云:“马市在城东,吴、蜀二主馆与相连。”⑥马市在建春门(东面北起第一门)外一里左右石桥之南,晖文里在东阳门(东面北起第二门)外二里御道之北,从空间位置来

---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崇义里”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8—90 页。田中一辉对赵逸事迹有所讨论,但关注点是史学正统观,《代北と中原——北朝の史學と正統觀》,《東洋史研究》75—3,2016 年,第 415—447 页。

② 王濬伐吴时为龙骧将军。太康六年十二月去世时,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阳侯,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二《王濬传》、卷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08、1216、76 页。

③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崇义里”条,第 89 页。

④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城内》“昭仪尼寺”条,第 55 页。

⑤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崇义里”条,第 90 页。元悦重修过一处古塔的“毁坏形像”“更加功力,在鎊令新,使如初妍”,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5 册《元悦修治古塔碑铭》,第 247—248 页。该塔或许就是赵逸指认的太尉府前砖浮图。

⑥ 张悛:《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注引《洛阳故宫名》,《文选》卷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44 页。

看,临近马市的“吴、蜀二主馆”,位于晖文里一带,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① 赵逸也许读过相关地志记载,也许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流传下来的洛阳城市掌故。不过,显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其中掺杂了他自己的附会或编造。

不管真实性如何,赵逸的这些指认,在当时显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点从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多次提及,不难感受到。② 问题是,为何会在正光初年出现这样一个沟通洛阳城市空间“过去与现在”的有趣人物呢?

如所周知,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七月,领军将军元叉发动政变,囚禁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改元正光,此后控制朝政约四年半左右,一直到正光六年二月胡太后复政。赵逸出现并活跃于洛阳,恰好是在元叉政变之后的几年间。据记载,元叉上台后“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③一度让士人颇为期待。赵逸此时出现于洛阳,会不会正是“迎合”了这一时期的某种诉求?

元叉执政后“颇以关怀”的“时事”之中,明堂营造是广受关注的一件。出土元乂(叉)墓志提到:

> 于时三雍缔构,疑议纷纶。以公学综坟籍,儒士攸宗,复领明堂大将。公斟酌三代,宪章汉晋,独见卓然,经始用立。④

被称作“国礼之大”的明堂,⑤是汉晋时期最重要的王朝礼制设施之一。北魏太和十年(486),曾由李冲主持在平城建造明堂。迁洛后战事纷扰,一直到宣武帝后期,明堂建设才提上日程。《魏书》卷一〇八之二《礼志二》:

>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至是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叉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由于早期文献语焉不详,汉晋明堂建筑带有想象成分。围绕着“上圆下方”、五室(《考工记》)、九室(《大戴礼记》)、“一屋”(西晋裴𬱟之说),以及明堂、辟雍、灵台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⑥ 北魏这场持续数年的明堂形制争论,主要集中于五室、九室的选择。⑦《魏书》卷三二《封伟伯传》就说:“寻将经始明堂,广集儒学,议其制度。九五之论,久而不定。”争论之后,在胡太后实际执政的孝明帝熙平(516—518)年间,最终决定采用五室。⑧ 几年后元叉政变,又改为了九室。

此前实际建设过的都城明堂,有西汉长安明堂、东汉魏晋洛阳明堂、南朝建康明堂和北魏平城明堂。其中,长安明堂建于平帝元始四年(4),“上圆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向五室”;洛阳明堂建于光武帝中元

---

① 此外,据王嘉《拾遗记》卷九,晋武帝曾将抚军大将军府之地赐于张华,或即张华宅,具体位置不详。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98—199 页。

② 郦道元注《水经·谷水》时,也提到宣武场西是贾充宅,永宁寺是曹爽宅,阮曲“云”为阮籍故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98、1414、1436 页)。这些认定不知是否也跟赵逸有关。此外,赵逸指认宝光寺遗址时提到,西晋洛阳有寺院三(四)十二所,相同记载亦见于《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029 页)。魏收在洛阳生活过,颇疑《释老志》也是依据赵逸之说。赵逸还曾批评过洛阳当时流行的墓志书写文化,认为“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惭逸此言”,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崇义里”条,第 89—90 页。

③ 魏收:《魏书》卷一六《江阳王继传附子叉传》,第 405 页。元叉之名,一作元乂。本文统一作叉。

④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6 册,北京:线装书局 2008 年版,第 18—19 页。

⑤ 魏收:《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 480 页。

⑥ 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22—42 页。

⑦ 当时赞成西晋裴𬱟一室说的人比较少,主要有河东裴延儁和河间邢臧(《魏书》卷六九《裴延儁传》、卷八五《文苑·邢臧传》,第 1529、1871 页)。

⑧ 主持明堂形制讨论的,是受到胡太后宠幸的清河王元怿。他应当是五室的实际决定者。

元年(56),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① 建康明堂采用西晋裴頠学说,放弃上圆下方形制,“四柱方屋,都无五九之室”,只有一间方殿。② 李冲主持建设的平城明堂,则是“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③ 比较奇特的是,汉晋洛阳的明堂、辟雍、灵台,是邻近但各自独立的一组建筑群,④平城明堂却是与辟雍、灵台合而为一。

明堂五室的依据是《考工记》,意味着复古周制。九室依据是《大戴礼记》,意味着沿用汉晋之制。也就是说,元叉上台后的改变,意味着取消了一度占据上风的复古周制,改为按照汉晋形制“恢复性”建设。⑤ 问题是,汉晋洛阳明堂早已毁坏不存,又如何具体建设?能够参考的李冲平城“明堂样”,⑥“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被隋代牛弘批评为“穿凿处多,迄无可取”,⑦缺乏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曾“亲眼见过”西晋洛阳明堂的隐士赵逸,就会颇受关注。此点从汝南王元悦认其为义父,不难想知。⑧ 这就让人怀疑,赵逸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于洛阳,会不会与此有关?

此点当然很难确认。如前所说,赵逸事迹中有很多神奇甚或虚妄之处。他取得权威性的两处指认,都是通过发掘验证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在宅中发掘出铭文古物,赵逸之前已经有过。城内永和里据说有董卓故宅,“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邢峦家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有铭云“董太师之物”。⑨ 董卓托梦向邢峦索回钱物未果,“经年峦遂卒”。此事发生在延昌二年(513)。⑩ 西阳门内永康里的元叉宅中,“掘故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⑪ 城内宜寿里段晖宅,掘得菩萨金像,座上有铭文“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于是“时人咸云”,此地乃是荀勖旧宅。⑫ 城南高显洛宅,据说是苏秦旧宅,曾掘得黄金,有铭文“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此事发生在元叉执政时,元叉还向高显洛索要过这些黄金。杨衒之议论说:“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⑬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是僧人伪造。

---

①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九《渭水》、卷一六《谷水》,第 1591—1592、1425 页。

② 魏收:《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第 1863 页。

③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三《灅水》,第 1150 页。参看赵永磊:《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学术月刊》2021 年第 1 期,第 183—196 页。

④ 三者的位置关系图,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⑤ 元叉任明堂大将时,副将是卢同(《魏书》卷七六《卢同传》,第 1684 页)。崔光之子崔励担任过明堂大将长史(《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子励传》,第 1500 页)。元叉从弟元玕短暂担任过明堂大将主簿(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7 册《元玕墓志》,第 141—142 页)。元叉原本想让王椿担任将作大匠,但王椿托病推辞(《魏书》卷九三《恩倖·王椿传》,第 1992 页)。据前引《魏书·礼志二》之说,元叉主持的明堂工程似乎仍未完成。《水经注·谷水》只提到汉晋明堂“基构”,未言北魏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秦太上公寺”条云:“至我正光中,造明堂于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又提到,孝昌初年设“募征格”于明堂之北,“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第 140—141 页)。另据《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九月孝明帝曾在“明堂”饯别西征的萧宝夤(第 237 页)。

⑥ 魏收:《魏书》卷四一《源子恭传》,第 934 页。

⑦ 魏徵等:《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303 页。

⑧ 元悦是孝文帝之子、清河王元怿之弟。元叉政变杀元怿,他“了无雠恨之意”,持桑落酒候饮于元叉,获得信任(《魏书》卷二二《汝南王悦传》,第 593 页)。

⑨ 《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和里”条,第 60 页。

⑩ 据《魏书》卷六五《邢峦传》,邢峦于延昌三年“暴疾卒”,第 1447 页。

⑪ 《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康里”条,第 39 页。

⑫ 《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宜寿里”条,第 55 页。

⑬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大统寺”条,第 139—140 页。

换言之,赵逸出现于洛阳之前,已经存在借由出土铭文古物“确认”宅舍历史空间的现象。元叉执政时期,这类事情也仍然在出现。而这些难辨真假的铭文古物背后,自然是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城市空间叠加关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阅读汉晋文献的同时,对于曾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汉晋人物和事件,充满想象,从而也对宅地的“过去”抱有了浓厚兴趣。自称“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的隐士赵逸,明显是一个虚妄之人,①之所以会在洛阳受到如此的关注和优待,就是由于弥漫于北魏洛阳城中的这种历史空间想象。不过如前所说,赵逸指认的洛阳“旧迹”,是否掺杂了他自己的附会或编造,是很可疑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些西晋洛阳的城市“知识”时,需要特别警惕。

二、重建、怀旧与空间考证——北魏洛阳与“过去”的联系

北魏新都洛阳的重建,从一开始就带有历史想象和怀旧色彩。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到洛阳,“巡故宫基趾”,感慨于宫殿“荒毁”,“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接着又“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②令李冲、穆亮和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在洛阳被复建为都城的过程中,这些残存的宫殿旧址和地面遗迹,成为重要参考坐标。

除此之外,洛阳建设似乎还参考了某种“旧图”。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六月诏书云:“可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③这里提到的“洛阳旧图”,所指不太确定。一种可能,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洛阳城图,如杨佺期《洛阳图》。④ 另一种可能,是李冲等人“经始洛京”时绘造的施工图。东魏迁都邺城时,起部郎中辛术曾上奏:“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⑤这种新造的施工图,仍然要参据以往的地志、城图等资料。辛术上奏还提到:“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为了确定已经毁坏的邺城建筑基址,他请求硕学大儒李业兴参与,“万门千户,所宜访询”。

宣武帝时,为了确定国子学位置,儒者刘芳引用过《洛阳记》的记载:“国子学官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接着又说:

> 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⑥

北魏迁都时,距永嘉之乱已经一百八十余年,主要宫殿“故趾”虽在,⑦一般建筑基址恐怕很多都毁坏无存。要想“佥复故趾”,仅靠地面遗存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证相关文献记载。这是刘芳引证《洛阳记》的原因。国子学设立于晋武帝时,据潘岳《闲居赋》所说,在城南太学之侧,所谓“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

---

① 赵逸自言两百五十岁,以及声称“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让人想起葛洪《抱朴子内篇》的一段批评:“余昔数见杂散道士辈,走贵人之门……为同人遍说所历,正尔,欲令人计合之,已数百岁人也。于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雾合,辐辏其门矣。”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二〇《祛惑》,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46 页。

② 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 173 页。

③ 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第 205 页。

④ 魏徵等:《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 982 页。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称,该图“一名《杨宫图状》”,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 页。杨佺期撰有《洛阳记》,与《洛阳图》关系不详。杨佺期在淝水之战后担任过河南太守,图、记编撰当与此经历有关。

⑤ 魏收:《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第 1862 页。

⑥ 魏收:《魏书》卷五五《刘芳传》,第 1221—1222 页。

⑦ 迁都以前,北魏孝文帝在建设平城太庙和太极殿时,曾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魏书》卷九一《术艺·蒋少游传》,第 1971 页)。

延国胄,左纳良逸”。① 但刘芳所引《洛阳记》,②却称国子学在城内“宫门之左”,颇有矛盾。③

关于洛阳的空间考证,郦道元《水经注·谷水》很值得注意。该篇洛阳城郭及郊外部分,引用三十余种文献(不包括考证名物类的《释名》《白虎通》等),考证东周至汉晋洛阳的空间遗迹。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史籍、地志、诗赋、典制、书信、人物传、笔记小说七类。地志类数量最多,有十余种:

> 《河南十二县境簿》《洛阳记》《洛阳地记》《晋太康记》《晋地道记》《晋中州记》《永初(山川古今)记》《述征记》《洛阳故宫名》《晋宫阁名》。

诗赋、书信和人物类则有:

> 张衡《东京赋》、潘岳《西征赋》、石崇《金谷诗集叙》、阮籍《咏怀诗》、李尤《平乐观赋》、李尤《鸿池陂铭》、袁氏《王陆诗叙》、陆机《与弟书》、朱超石《与兄书》、《文士传》、《竹林七贤论》、《释法显行传》。

郦道元能够看到的这些文献,在洛阳重建为北魏都城的过程中,大都也会成为都城空间“考定是非,参古杂今”的参考。《洛阳伽蓝记》提到,常景和刘芳曾一起“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④ 在他们“造”名的过程中,或许就参考了郦道元提到的《晋宫阁名》《洛阳故宫名》等文献。

当文献记述出现歧义时,需要进行考辨。翟泉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处。当时有种说法,认为昭仪尼寺之池就是周代翟泉遗址,依据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郦道元辨析说:

> 渠水又东,径杜元凯所谓翟泉北,今无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泉源既塞,明无故处,是验非之二证也。杜预言:翟泉在太仓西南。既言西南,于雒阳不得为东北,是验非之三证也。稽之地说,事几明矣,不得为翟泉也。⑤

据《洛阳伽蓝记》所云,当时主张杜预之说的,是“京师学徒”。杨衒之也反对这一看法,认为“晋太仓在建春门内,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今在太仓西南,明非翟泉”。⑥ 但他和郦道元一样,主要是根据翟泉和太仓的方位关系予以论证。真正为此池“正名”的是赵逸。如前所说,他声称此池原本是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这个指认被广泛接受,“于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赵逸的指认,质疑昭仪尼寺之池并非翟泉,会仍存争议。赵逸的“意义”正体现于此。

北魏洛阳存留的汉晋古迹中,最有象征意义的自属城南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遗址。班固《东都赋》和张衡《东京赋》都强调,东汉洛阳之所以优于西汉长安,正是由于这些礼制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如班固所说:“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 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⑦对此上节已有涉及。尤其是太学遗址保存的石经,成为最具视觉感的文化遗迹。前面提到,孝文帝曾观览这些石经。与此同时,太学的原址重建问题,也是迁洛后的重要“时事”,不断被提起。宣武帝时,郑道昭任国子祭酒,有感于“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上表请求营修,未获成功。多年后他再次上表说:“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

---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五《潘岳传》,第 1505 页。

② 当时有陆机、华延儁、杨佺期等几种《洛阳记》流传,参看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7—389 页。

③ 参看福原启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第三章《关于西晋国子学创立的考察》,陆帅、刘萃峰、张紫毫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0—106 页。

④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城内》“永宁寺”条,第 4 页。

⑤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 1416 页。

⑥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城内》“昭仪尼寺”条,第 55 页。

⑦ 班固:《东都赋》,《文选》卷一,第 39 页。

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①石经和太学所象征的汉晋太学生活动,想必也经常会被北魏洛阳的士人官僚们所追想。

由于工程原因,北魏洛阳也有一些出土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宁寺建设时发掘的“窟室”,据说该地是曹爽故宅。《水经注》卷一六《谷水》:

>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犊,信矣。

迁洛之初已经预留了永宁寺建设用地,②但直到孝明帝熙平元年才动工,“窟室”就是此时所发现。《洛阳伽蓝记》花费大量篇幅讲述永宁寺,提到“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③没有提到“窟室”发掘及其与曹爽故宅的关系。据《三国志·曹爽传》及注引《世语》等记载来看,曹爽确实曾在住处建造过“窟室”,④但其位于武库之南的府邸,在洛阳城东北部,⑤而永宁寺位于南部,二者相去甚远。

地面遗迹,出土新发现,这些和文献中的洛阳相结合,构成了北魏新都营造过程中由于空间叠加而造就的历史情绪。郦道元注谷水时,往往会特别提到某些地点与汉晋人物或事件有关。如城西石梁所在的皋门桥,是潘岳《西征赋》提到的“秣马皋门”;建春门石桥,是“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处;洛阳马市是“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直通宣阳门的御街,“曹子建尝行”于此,“犯门禁,以此见薄”;东郊尸乡之野,“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⑥ 正是这种情绪,使得北魏洛阳不同于之前的都城平城,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城氛围。⑦

这可能正是孝文帝所期待的结果。孝文帝是带着对洛阳的种种历史想象而迁都的。太和十七年到洛阳,“至北邙,遂幸洪池”,在龙舟上告诉任城王元澄,他梦到了嵇康之子、死于八王之乱的西晋侍中嵇绍,“神爽卑惧,似有求焉”。元澄答云:“陛下徙御瀍洛,经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⑧所谓“希恩”,自然是奉承之语,但隐含的孝文帝与华夏历史人物的联结心理,是很明显的。前面提到,赵逸指认昭仪尼寺之池与石崇、绿珠有关后,“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北魏元氏诸王斗富,也往往提到石崇,如河间王元琛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又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⑨以文章著名的常景,由于出任过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⑩ 生活在北魏洛阳的鲜卑贵族和士人官僚,对于汉晋时代的洛阳人物和掌故显然有浓厚兴趣,经常自我比拟。

北魏洛阳的建设,当然不只是“复制”汉晋。宣武帝时在郭城筑坊,可能有平城时代的习惯因素。

---

① 魏收:《魏书》卷五六《郑羲附子道昭传》,第 1240—1241 页。
②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 3044 页。
③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城内》“永宁寺”条,第 2 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85 页。
⑤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3—128 页。武库南的府邸以外,曹爽可能还有别的宅邸,可惜史料缺考。
⑥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 1383、1400—1403、1416、1440 页。
⑦ 《洛阳伽蓝记》记述了不少与空间叠加有关的文化想象。如城南崇虚寺,原是东汉濯龙园,北魏迁都之初“以地给民”。由于曾是汉桓帝祠祀老子的神圣之地,“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城东北上商里,据说是殷顽民所居之地,孝文帝命名为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几刺,竟皆去之”。以上两条,分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城南》“崇虚寺”条(第 183 页)、卷五《城北》“上商里”条(第 249 页)。
⑧ 魏收:《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 465 页。
⑨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城西》“寿丘里”条,第 207—208 页。
⑩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城内》“永宁寺”条,第 4 页。

孝明帝即位后,城郭内外寺院和佛塔的急速扩张,更显示出佛教对于洛阳都城空间的巨大影响。即便是所谓“汉晋之制”,原本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内容。北魏重建洛阳作为华夏正统象征,其实面临着在汉制、晋制乃至周制之间的取舍。上节提到的明堂形制讨论就是如此。再如东汉洛阳宫殿的题额,均使用大篆字体。曹魏时北宫用八分体(隶书),南宫则用古篆书。北魏迁洛之后,“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① 可见迁洛之后,在题额书法上就曾经有过改易。这是一种微妙的文化选择心理。

与此相关,在新都建设和空间考证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以往文献记述的讹误。城东建春门石桥原本有铭文“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孝昌三年(527)大雨时毁坏。但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都说,此桥为“晋太康元年造”,杨衒之批评道:“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②如果把这种对江南人游记性地理文本的批评,与北魏末年南人陈庆之入洛后与杨元慎的“正朔”争论相联系,③其中反映的文化心理是很值得玩味的。

三、从铜铸设施到石经:被迁移的洛阳文化景观

永嘉之乱以后,继起的五胡政权往往形成东西对立局面,处此之间的洛阳,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以至于“久为边裔,城阙萧条,野无烟火”。④ 尽管如此,洛阳始终是人们观念中的特殊之地。石赵政权在灭掉关中刘曜力量、统一东西后,“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并修治过洛阳宫室。⑤ 石勒在都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⑥宫室制度等方面也对洛阳多有模仿。

值得注意的是,石赵政权迁移过洛阳的一些设施到襄国和邺城。先是石勒时期,“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⑦ 石虎之时,又“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⑧ 他们迁移的,主要是洛阳城中的一些大型铜铸设施。其中有一些是东汉和曹魏时期从长安迁移至洛阳的西汉旧物,有一些则是曹魏时期在洛阳新铸的。

都城中陈列装饰性的大型铜铸物,秦都咸阳和西汉长安已经出现。最著名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之兵”所铸十二铜人,“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⑨ 由于是按照夷狄形象铸造,⑩也被称作金狄。汉末董卓据长安时,这些铜人(翁仲)大部分被熔毁,仅剩下两个。魏明帝曾计划迁移将其到洛阳,由于太重而未能成功,留在了长安附近的霸城。潘岳《关中记》云:

> 秦敛天下兵器,铸以为铜人十二,置之诸宫。汉时皆在长安,董卓坏以为钱,余二人徙在青门里东宫前。魏明帝欲徙诣洛,载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诸侯,以为郡县。正法

---

①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 1410 页。

②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明悬尼寺”条,第 73 页。

③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孝义里”条,第 117—119 页。

④ 魏收:《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第 736 页。

⑤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 2748 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 2737 页。

⑦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 2738、2742 页。

⑧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 2764 页。

⑨ 司马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及索隐,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963—1964 页。关于秦汉都城的铜人,有不少讨论,参看林通雁:《西都:汉长安城美术史迹的发现与研究》第四章《宫苑雕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0—249 页。

⑩ 班固:《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72 页。

律,均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书也。①

此事亦见于《魏略》,称魏明帝“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② 可见正是迁移长安铜人未果,魏明帝才下令在洛阳新铸。石赵迁移的洛阳翁仲,就是司马门外这对曹魏新铸铜人。③《水经注》卷一六《谷水》云:“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记述的正是铜人被移走后,仅存残损石座的情形。

铜马、飞廉也是西汉长安旧物,东汉明帝时迁置于洛阳平乐观。应劭云:“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④二者都是汉武帝时所铸。铜马原本立于长安宫城金马门外,是“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⑤金马门亦得名于此。铜飞廉原在长安上林苑飞廉观,观名即来自于铜飞廉。⑥《水经注》引用应劭、晋灼等人关于飞廉的注释后,又说:“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⑦据此,似乎铜飞廉在汉末曾被董卓所熔毁,铜马则得以幸存。⑧ 如果是这样的话,石赵迁移到邺城的飞廉,或许也是魏明帝在洛阳重铸的。

石虎迁移的“九龙”,也是魏明帝所铸。据记载,魏明帝曾花费巨大财力铸造“黄龙凤皇奇伟之兽”,⑨以及“九龙、承露盘”等大型铜设施,“其功参倍于殿舍”。“九龙”可能是九龙殿前吐水之物。⑩黄龙、凤凰分别高四丈、三丈余,置于内殿之前。承露盘“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上盘径四尺,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⑪ 魏明帝计划迁移的长安铜铸物,本来也有承露盘,但迁移过程中折断。上述铜铸物中,黄龙、凤凰和承露盘是否也被石虎迁移,不太清楚。

石虎迁移的钟簴,是宫殿、宗庙和帝陵器物,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均有。⑫ 前面提到,魏明帝也迁移过长安钟簴到洛阳。潘岳《关中记》云:

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铜钟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门里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钟,东者杜陵钟也。⑬

---

① 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一七《握真辅第一》,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19 页。潘岳《关中记》已佚,《真诰》所录诸条,为东晋中期杨羲抄写。参看魏斌:《东晋士人的风土阅读与故国认知》,《历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2—94 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第 110 页。

③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〇《浊漳水》:“又徙长安、洛阳铜人,置诸官前,以华国也。”第 937 页。据此石虎也迁移过霸城的金人至邺城。

④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应劭注,第 193 页。参看林通雁:《西都:汉长安城美术史迹的发现与研究》第四章《宫苑雕塑》,第 261—268 页。

⑤ 班固:《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如淳注,第 2617 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下》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988 页。

⑦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 1420 页。

⑧ 范晔:《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第 2325 页)此说与《水经注》明显矛盾,熊会贞认为郦道元“乃别有所据”(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六《谷水》,第 1421 页)。

⑨ 陈寿:《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第 711—712、111 页。

⑩ 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第 105 页)北魏洛阳也有九龙殿,《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瑶光寺”条称,九龙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第 46 页)。

⑪《艺文类聚》卷九八曹植《露盘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99 页。

⑫ 范晔:《后汉书》志六《礼仪志下》引《古今注》,对东汉帝陵钟簴有所记载,第 3149 页。

⑬ 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一七《握真辅第一》,第 519 页。《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也提到,魏明帝曾“西取长安大钟”,第 709 页。

据此,至少长安平陵、杜陵二钟同样由于太重而没有迁移成功。石虎迁移的钟簴,也许是东汉以来洛阳铸造之物。这些铜铸物很重,据说后赵牙门将张弥在主持迁移的过程中,“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① 陆翙《邺中记》提到,邺城有铜钟四枚,“如铎形,高二丈八寸,大面广外一丈二尺,小面广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绕其上”。② 这些铜钟可能就是从洛阳迁移而来的。

这些被迁移的铜铸设施中,铜驼最广为人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后来成为西晋都城洛阳的象征之物。陆机《洛阳记》云:

> 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③

魏明帝计划从长安迁移的设施中,有“骆驼”,应当就是指这对铜驼。只是现存文献中没有看到关于西汉长安铜驼的记载,铸造由来不太清楚。《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提到了这对洛阳铜驼,说“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又引陆机之说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阊阖门南街也因此被称作铜驼街,成为西晋洛阳最具象征性的街道空间。西晋后期,预感到天下将乱的索靖,曾指着“宫门铜驼”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耳!”④这对铜驼被后赵政权迁移到邺城后,安置在中阳门外。陆翙《邺中记》:“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⑤这个位置,正好相当于洛阳的阊阖门外。

这些铜铸设施,构成了从长安到洛阳延续的汉晋都城装饰文化。始皇帝金人,汉武帝铜马、飞廉,说起来都是带有权力夸耀性的装饰设施,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他们帝王伟业的象征。汉明帝、魏明帝的迁移和重铸之举,大概是受到类似政治心理的驱使。《魏略》说,魏明帝“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⑥ 石勒和石虎迁移这些铜铸设施到都城襄国和邺城,“以华国也”,可能也是希望在新都城再现洛阳的装饰文化,夸耀国威。

被迁徙到邺城的这些铜铸设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又被迁移到长安,最终熔铸为钱。⑦ 之后,赫连勃勃兴造统万城时曾重新铸造:“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⑧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后,这些新铸设施去向不明。宣武帝永平四年(511)五月,曾“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⑨这件平城铜龙是否来自于统万,不太清楚。⑩ 至少从现存文献来看,汉晋都城一直延续的铜铸装饰文化,北魏时代似乎并没有那么热衷。据前引《水经注》记载,洛阳的翁仲、铜驼旧址,北魏时期仍然存在,铜驼街之名也延续使用,但却并未尝试重铸相关设施,以恢复魏晋旧貌。这也成为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重要景观差异。

---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 2764 页。

② 《初学记》卷一六《乐部下·钟》,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96 页。

③ 《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州郡部四·西京河南府》,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770 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〇《索靖传》,第 1648 页。

⑤ 《初学记》卷二九《兽部·驼》,第 709 页。

⑥ 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第 105 页。

⑦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载,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三月,“秦王坚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3300 页)。据说前秦迁移的翁仲有三个,“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四《河水》,第 348 页)。

⑧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第 3206 页。

⑨ 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第 210 页。

⑩ 北魏曾迁移过石赵邺城东门的一对石桥柱到平城,置于宁先宫之东,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一三《灅水》,第 1147 页。

有意思的是,东魏迁都邺城后,迁移的洛阳设施是石经,时在武定四年(546)。①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八月诏书云:"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②如所周知,洛阳石经有东汉石经(隶书,四十六碑)、曹魏石经(篆、科斗、隶三体,三十五碑)两种。据陆机《洛阳记》、戴延之《西征记》记载,东汉石经西晋时仅十七碑完好,曹魏石经在东晋末年尚存十八碑。③ 北魏迁洛以前,冯熙、常伯夫先后任职洛阳,热衷营造佛寺,石经诸碑"废毁分用,大至颓落"。④ 东魏迁移石经到邺城时,行至河阳,"值岸崩",有不少"没于水"。⑤ 所谓"五十二枚",从数量来看,可能包括了当时保存相对较好的东汉、曹魏两种石经碑(可能也有一些残石),而不仅仅是东汉石经("蔡邕石经")。北齐灭亡后,这些石经碑先是被运回洛阳,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又被运至长安。据说运至长安时,已经"文字磨灭,莫能知者"。⑥

东魏新建的邺南城,一定程度上是对北魏洛阳城的仿建。迁邺之初,辛术曾说:"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⑦邺南城的建造材料,有些也是从洛阳拆除运来。⑧ 在这种情况下,东魏的石经迁移之举,或许有文化层面的考虑,或许只是为了"复制"新都的需要。不管如何,由于石经的儒学象征色彩,使得这次迁移之举,也包括北齐灭亡后石经先被迁回洛阳,又被迁至长安,具有了更多文化正统性层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迁徙铜铸设施"以华国也"。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永嘉之乱后,洛阳先后由多个政权统治,但显然铜铸设施较之石经更受关注。⑨ "颇慕经学"的石虎,也只是"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祕书"。⑩ 北魏迁洛,虽以塑造华夏正统为指向,却并未在铜铸设施旧址上恢复性重铸,以重现汉晋都城的装饰文化。换言之,北魏洛阳时代,铜铸设施似乎已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的都城文化象征意义。这是东魏将石经作为洛阳文化象征之物迁移到邺城的背景。

结　语

在旧都废墟上叠加建设新都城,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这种做法无形中强化了新兴政权与过往王朝的空间延续性和文化联系,也塑造了更具历史感的城市氛围。北魏洛阳时代人们对于魏晋洛阳古迹的兴趣,就是如此。

北魏新都洛阳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文化面貌。从迁都者孝文帝的设想来说,是要恢复性重建一座象

---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城南》"国子学堂"条,第 146 页。

② 李百药:《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53 页。同书卷六《孝昭帝纪》也提到了这些石经,第 82 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注引陆机《洛阳记》,第 1990 页;《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五·碑》引《西征记》,第 2654 页。郦道元和杨衒之对洛阳石经均有记载。石经碑数有争议,历来考证颇多,参看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姚文昌点校,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 年版,第 40—52、199—204 页。

④ 魏收:《魏书》卷八三上《外戚·冯熙传》,第 1819 页。

⑤ 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第 947 页。

⑥ 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焯传》,第 1718 页。

⑦ 魏收:《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第 1862 页。参看徐光冀:《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编:《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3—355 页。

⑧ 《魏书》卷七九《张熠传》提到,东魏"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儁奏云:"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第 1766 页。

⑨ 其中也包括北伐收复洛阳的桓温,建议将都城回迁洛阳未果后,又有过迁移洛阳钟虡的想法,遭到反对(《晋书》卷七五《王湛附孙述传》,第 1964 页)。

⑩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 2774 页。

征华夏正统的都城。为了这一目的,宫殿、官署、礼制建筑等政治权力空间,“佥复故趾”。不过,设想总归是设想,从之后数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新都洛阳一方面如孝文帝所愿,造就了一种汉晋历史氛围,一方面却又呈现出新的面貌。

汉晋帝国的都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象征之物。一种是以大型铜铸设施为代表的夸耀性装饰文化,一种是以明堂、辟雍等为代表的礼制景观。北魏洛阳一直没有恢复性重铸被石赵迁移走的大型铜铸设施;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虽然不断在动议重建,但进度缓慢,一直到北魏灭亡也只是很有限的“恢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者对于寺院和佛塔的营造热情。① 巨大而华丽的寺院,高耸入云的佛塔,取代大型铜铸设施和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事实上成为北魏洛阳最具视觉冲击性的都城景观。② 杨衒之在面对再次废墟化的都城洛阳时,选择以佛寺作为记述主体,或许也与此有关。对照东汉时期班固《两京赋》和张衡《二都赋》的都城描绘和关注重点,变化是毋庸多言的。

混合着汉晋氛围、胡族习惯和佛教因素的北魏洛阳,在新与旧的叠压中,塑造了一种新的都城风景。城南“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的灵台,被汝南王元悦别出心裁的“造砖浮图”于其上,③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事例。这就让人感到好奇,对于北魏时代的洛阳人群来说,什么才是他们观念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围绕着赵逸的古迹指认,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对于汉晋时代的热情,与此同时,寺院的香火和林立的佛塔,也展示着都城洛阳的另外一种活力。但不管如何,由于历史叠压而带来的对于“过去”的好奇和热情,确实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都城空间氛围——脚下的土地是典籍中那些历史故事的发生地,不免引人遐想。而这种空间氛围,会在无形中强化拓跋政权与汉晋国家的连续性。

What Luoyang Was Like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Imagined by the Luoyang People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Space, Historical Site and Memory

Wei Bi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uperimposed relationship of the Luoyang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with the Luoyang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had its inhabitants filled with imaginations about the historical sites,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ynasties in the same space, thus creating a special urban mood, and shap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Tuoba (拓跋) regime with the Han-Jin states atmospherically. The hermit Zhao Yi's (赵逸)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which was recorded in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in Luoyang* (《洛阳伽蓝记》) by Hyang Xuanzhi (杨衒之), took plac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ern Wei" Luoyang and the "Han-Jin" Luoyang. In addition to the well-known temples, pagodas and neighborhoods, the missing of bronze casting facilities is worth noting.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such bronze casting facilities for bronze figures in front of tombs (翁仲), bronze camels, bronze horses, and bronze mythical creatures (飞廉) constituted the continuous capital city's decoration culture from Chang'an (长安) to Luoyang. After the Yongjia Rebellion (永嘉之乱) in the West Jin Dynasty (西晋), these bronze casting facilities were relocated, and no attempt was made to restore their original sites after the capital was moved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Key words: Northern Wei Period (北魏); Han and Jin Dynasties (汉晋); Luoyang (洛阳); historical site; memor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 1472 页。

② 从铸造材料来说,当时有大量的铜被用于铸造佛像。如平城天宫寺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去“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 3037—3038 页)。

③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城南》“秦太上公寺”条,第 140 页。